

7-1-2020

不安的中國：新浪微博公共事件的個案研究

Zhifan J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紀志帆 (2020)。不安的中國：新浪微博公共事件的個案研究。文化研究@嶺南，66。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vol66/iss1/8/>。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不安的中國：新浪微博公共事件的個案研究

紀志帆

引言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浪微博#/media/File:Sina_Weibo_logo.svg）

一則關於幼兒園的新聞在年末點燃了中國互聯網。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關於北京市朝陽區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教師涉嫌虐待、猥褻兒童的消息，在中國大陸社交網絡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出現。到二十三日晚，這則消息經過媒體跟進報道，引起了中國互聯網的巨大反響——演員章子怡在微博譴責新浪微博通過撤銷「紅黃藍」關鍵詞搜索熱度來壓制輿論，她的這則微博在一天時間內得到將近一百二十萬的轉發。

從新聞出現、傳播，到官方公佈調查結果，無數中國網民參與到這一公共事件中。他們對性侵兒童和媒介審查感到憤怒，對幼教行業感到不信任和不安，對國家失去信心……這些互聯網上的集體情感，作為當代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以及情感生活的一種面向，正構成了「深層的中國」（deep China）——當代中國人的情感體驗，是政府政策、社會組織、市場行動的之下，中國社會和中國生活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這些情感是當代中國

人對社會變化的回答和再答¹。詳細地討論網絡空間裏的情感爆發，可以為我們理解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切面。而理解互聯網空間中「深層的中國」，無法避免也不能無視互聯網媒介本身。它的媒介內容本身、和內容生產、傳播機制，組成了超過三億的微博使用者的公共生活空間²，也是中國網民與官方權力、市場等結構力量互動的結果。本文將會以此個案為切入點，把這些強烈的集體情感，與微博這一情感生態空間連接起來，從情感生成的角度分析為什麼這一事件會有如此巨大的反響，希望能夠考慮媒介因素的情況下描繪當代中國的精神圖景。

憤怒、震驚和不信任

憤恨 (hate)、震驚 (shock) 交織出現，是紅黃藍幼兒園事件最為突出而普遍的公共情緒，這些情緒既有兒童虐待引發的倫理反應，也有性政治的情感投射，既有對想象中的恐怖的反彈，也有日常生活被擾亂的情感需求。這些特點相較於此前類似的互聯網事件，顯得更加突出。相比同樣在十一月發生多起幼師虐童事件，如上海攜程親子園、河北深州幼兒園、河南商丘幼兒園，出現在這一連串事件之後的紅黃藍幼兒園事件有著更多樣更強烈的情感面向：公眾受到強權壓迫的想象，集體猥褻兒童的想象（「軍隊參與」與「性侵兒童」均被官方宣佈為不實），突發公共議程對日常生活的擾亂。

毋庸置疑，猥褻兒童觸動了公眾的性道德底線，而當微博被想象成為強權操縱用以維護不道德的工具的時候，憤怒譴責迅速蔓延。在二十三日，微博上已經出現紅黃藍幼兒園出現集體猥褻兒童的消息，匿名消息稱幼兒園經常安排「醫生」為學童進行「裸體體檢」。而當人們發現幼兒園的運營管理與軍隊有關時，很快幼兒園又被視為為軍隊提供集體褻童的罪惡之地。當幼兒園事件引起廣泛關注之時，微博卻出於某種原因取消「紅

黃藍幼兒園」這一關鍵詞的搜索熱度。³人們感覺到自己所關注的公共議題正受到有意識的打壓，就聯想到是軍隊企圖阻止這一議題繼續受到關注。⁴在二十六日調查結果公佈之前，在公眾想象中，紅黃藍幼兒園被視為軍隊利用權力性侵猥褻兒童的機構，並且軍隊企圖利用權力掩蓋罪惡。人們對幼兒園感到不安與不信任，並且人們以一種想象的方式體驗到「權力」對言論的控制。這種造成不安的「權力」如此普遍而隱秘，它就潛伏日常生活之中，在幼兒園中、在微博中。人們日常所信任的幼兒園及互聯網言論空間正露出他們充滿危險的一面。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濃烈的公共情緒已經散去。公安機關公佈調查結果：除了針扎虐待屬實，性侵兒童、餵食藥片的嫌疑或是證明為謠言，或因為證據不足無法證實。⁵這意味著，公眾被迫著面對一種顛覆觀念的可能：自己為社會不公的發聲只是被欺騙的結果。聲明一出，輿論嘩然，當然也有人為真相「水落石出」感到放心。然而更多地，公眾體驗到了極為猛烈的情感撞擊：有人無法擺放不安與信任，為事態「反轉」感到非常困惑、無所適從；有更多的人則轉向對政府的不信任，認為官方所提供的證據不足和造謠的結論依然是在包庇幼兒園及背後的權力，「塔西佗陷阱」成為一個流行詞彙已經足以說明。⁶如果描繪公眾当下的情感狀況，那麼無疑是一種廣泛而切身的困境：除了少數人可以獲得預言謠言的滿足和對社會的信心⁷，多數人對潛伏日常生活（比如幼教機構與網絡言論）秩序的不安沒有散去⁸，懷疑、不信任、矛盾、困惑又接著蔓延⁹。官方話語的造謠論或許可以以命名他者的方法暫時安撫部分不安，但對於公眾生活廣泛的不安以及焦慮情緒卻是一種無效行動，更何況是被引爆的了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國家、性侵與審查：媒介內容與形式的結果

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的爆發的集體不安、不信任、憤怒，作為一種線上的集體情感行動，始終是在提供可能性的互聯網空間中成為可能的。這也就意味著情感的形成並不是偶然。哪怕從經驗上來說，如果對近年微博上的公共事件稍加留意，也會發現它們在情感表達，傳播方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而本節的意圖，正是揭示微博作為一個權力交織的情感生態空間，與行動的情感（actional emotion）之間的關係。

媒介內容、中國網民及中國官方共同參與塑造了互聯網空間中情感圖景，為了能完整理解整個情感形成的生態，我們就需要一個至少能囊括話語、語境與情感能動性的視角。而這正是政治學者 Colin Hay 力圖達至的對結構能動性二元論的克服。他在其「話語與策略選擇性（Discursive and strategic selectivity）」理論中指出，行動者在選擇性的語境中採取選擇性的解讀和行動，其結果最終會影響行動和語境。¹⁰結構選擇的語境為行動者提供行動的環境和依據，就好比是認知過濾（cognitive filter）¹¹，然而行動者會做出各種解讀而採取行動，其結果可能是滿足意圖的也可能是意圖之外的。也就是說，在微博這個傳播結構中，權力大小不同的中國官方與持各種意見的中國網民，在各種行動中塑造了行動的語境和行動本身。



(圖片來源：<http://www.rfi.fr/tw/中國/20191002-高德蒙如是評論習政權-指北京必民主是大錯覺>)

穩定話語 (stability discourse) 是維護中國政權穩定與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中國官方從前網絡時代到如今都保持著運用或鼓勵這一話語的姿態。¹²穩定話語，在一方面以積極價值維護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權威，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否定性價值，它將建構起來的「他者」非法化，諸如「法輪功」、「港獨」、「境外反華勢力」，他們將會破壞中國取得的發展，使中國陷入混亂。¹³中國網民當然不是被動地接受這套話語。以電影為例，他們是在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勾連 (articulate) 穩定話語和消費體驗，尤其是情感體驗。網民對電影《戰狼 2》的一致評價極具代表性——通過這部講述中國軍人在屠殺中拯救非洲難民與僑胞的電影，消費者將觀影的情感體驗和影片提供的文本融合為一種強烈的愛國情感：「生活在中國這個和平安定的國家是多麼的幸福」¹⁴、「你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雖然總是抱怨，但是，在國外有困難時，祖國是你最堅強的後盾」。¹⁵消費者們從娛樂體驗中勾連「不穩定」帶來的不幸，國家「穩定」的正面價值。從這個例子來看，想象中國的「和平安定」，是中國網民在文化消費中不停地與官方穩定話語勾連的動態過程。因此，我們可以部分理解為什麼人們面對紅黃藍幼兒園事件的報道會如此震驚，以致於「善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成為一時的網絡流行語。因為這一事件作為一種社會悲劇有力地衝擊人們與官方話語合謀想象的「和平安定」，使得中國網民的想象與現實變得無法協調、甚至格格不入。更何況在一開始，集體性侵犯的嫌疑一直與軍隊這一國家機器擺脫不了關係。這種想象與新聞事實的錯位的體驗被網友「愛拆快遞的安妮」形容為「閉眼是盛世，睜眼是熔爐」¹⁶：中國網民似乎再無法以逃避姿態沉浸在「盛世」想象了。

但考慮到類似事件（如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在此前也同樣發生過，卻沒有如此巨大的社會反響，社會悲劇對想象的破壞顯然不能完整解釋這一事件的公眾參與程度和情感強度。但也正是在同類事件的參照下，紅黃藍幼兒園事件露出它獨特的政治面向：針對「戀童癖」的性政治行動和公眾針對媒介審查的文化政治行動。

兒童性侵，無論真實與否，它喚起的集體震驚、憤怒與焦慮，清晰地折射出集體情感行動中的性政治內涵。在一段出處不明的視頻中，一位「母親」轉述了自己孩子的所見所聞和遭遇，這段視頻是性侵嫌疑產生的主要消息來源。在視頻中，她描繪了這樣的性侵者形象和行為：一些中年或老年男性假扮醫生以檢查身體的名義給孩子打針餵藥，強迫孩子赤裸身體，對他們進行「活塞運動」¹⁷；如果有孩子反抗，他們還會覺得掃了興致。他們偽裝、尋樂、施暴。他們不僅觸犯道德，甚至仿佛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對於公眾而言，就是這樣的一個群體在公眾視野之外作惡，他們匿名（anonymous）地生活在社會之中，甚至在這裡他們可以匿名地影響媒介審查以繼續躲藏。也就是說，這些性侵者被視作隱形而又具有極大權力的危險。而大家所支持的解決危險的方法就是：國家權力嚴厲介入，比如死刑。這種兒童性侵者話語建構，有著強大的情感動員的能量：它凝聚起了整個社會的焦慮與不安並提供了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¹⁸現代社會的孤獨、不明晰的生活前景、工作制度和消費文化的擠壓、教育與階層固化……突如其來的不明確的性侵「罪惡」，為深植於社會的沉重和壓抑提供了緩解的出口。這些情感絕不能被簡化為「暴民」的非理性或是專屬於中產階級的焦慮。

媒介審查的角色同樣不能忽略：它既作為權力的象征參與公眾的情感生產的過程，它本身也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影響著互聯網的集體行動。非常清楚，公眾對新浪微博屏蔽

「紅黃藍幼兒園」尤為憤怒，因此才有前言中章子怡微博轉發過百萬的情況。在公眾想象中，「國家」不僅性侵犯了兒童，還企圖用審查掩蓋罪惡。但問題仍在於解釋這一事件的獨特性——新浪微博對公共事件的媒介審查事實上相當常見，這一次卻意外地引發了眾怒。我認為這種廣泛的參與度，是因為廣泛地被觸及性道德底線的公眾，被邀請到了針對媒介審查的政治行動中。而這種可能恰恰是媒介審查的網絡形式所暗含著的政治潛力。這種悖論式潛力在於，當媒介以製造消失（making disappearance）的方式企圖將公共事件抹除出公眾視野的時候，公眾通過命名和傳播，將「消失」可視化。中國網民或是主動、或是被邀請地目擊到了「消失」。無論是因為擁有千萬粉絲的明星轉發（reblog），還是網絡社交關係的對象轉發，當「『紅黃藍』上不了熱搜」頻繁地出現在每個人的微博信息流中，有些甚至主動去搜索「消失」以一種可見的方式被命名出來，每個人都看見了「消失」，都成為「消失」的目擊者。這一過程使中國網民成為一個暫時的集體：目擊者。這種集體性的形成正是集體情感行動的一個前提。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指出，「可感覺事物的分佈揭示了誰是社群中共同事務的參與者，這種方式依據的是他們做了什麼及其這些活動被呈現的時空。」¹⁹媒介審查的發生，網民主動採取命名「消失」的方法，將審查的政治行為變成了一種可視的當然也是可感覺的事物，當可以被感覺的「消失」在社交網絡中傳播開去，網民們同時以一種集體的規模成為了「消失」的目擊者。而隨著互聯網的傳播，參與目擊的社群規模也在不斷擴張。這也使得較為一致和持續的集體輿論變得可能。換言之，這樣的集體行動離不開社交網絡在形式上提供的可能。

從生成機制來看，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的集體情感行動，是已有的文化底色和傳播結構的偶然結果。一則謠言式的新聞，因為「集體性侵兒童」釋放了當代中國的情感壓

力，無論有意無意，它裹挾的對「國家」的質疑又衝擊了當代愛國主義的想象，使這些情感更加強烈。震驚、焦慮、憤怒的集體情感為集體行動提供了動力。當集體行動醞釀而成，中國網民又在與媒介審查的互動中，強化了自身行動的集體性，來回應官方行動等等事態變化。

小結

「悖論」是我們理解紅黃藍幼兒園事件的一個啟發式線索。一方面，如果說「表層中國」是政治穩定與經濟、科技發展的「盛世」，那麼「深層中國」是不安的世界。一個至今以不確定的面貌存在的公共事件，出人意料地釋放了當代中國暗藏著的集體情感壓力。這些集體情感呈現在我們面前，就是當代中國理性與強權話語裏的憤怒、震驚。另一方面，集體情感在互聯網空間裏有著強大的動員能力，而這些力量轉化為集體行動的一個條件，恰恰是象徵與執行權力的媒介審查；面對製造消失的媒介審查，中國網民藉助可視化的行動強化了集體行動的主體性，再一次發起了有實質效應的互聯網集體行動。

值得強調的仍然是幾個悖論式的判斷：愛國主義情感更強烈，一個能動搖這種高強度情感的事件所釋放的情感動力也就越強大；情感推動的集體行動有著極強的動員能力，但情感的迅速衰退也讓運動失去持續的動力；媒介審查既是控制本身，也提供著情感上、形式上與行動上反控制的空間和可能。這些判斷在什麼語境（context）可以成立，又有多大程度的解釋力。本文只是拋磚引玉，希望通過討論這些議題的討論使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情感政治、互聯網與文化政治的關係。

註釋

¹ Arthur Kleinman et al.,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1-3.

² 李土金，〈中國大陸新浪微博用戶分佈特征初探〉，《中國市場》，第4期，2017年2月，頁142-146。

³ 在新浪微博的算法中，當一個關鍵詞被頻繁搜索就會成為「熱搜」進而被放在所有用戶可見的「熱門」模塊。但是，在技術角度上，微博後台也可以人為地干預該模塊的呈現。

⁴ 這類觀點可見於：<https://m.weibo.cn/1890897353/4177550005594474>，
<https://m.weibo.cn/2025163877/4177418866454974> 或 <https://m.weibo.cn/5255963020/4177591492101167>。

⁵ 公安聲明可見：<https://m.weibo.cn/5556545776/4179178041306278>。

⁶ 官方承認該事件顯示出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對政府的強烈不信任。當然官方更可能想暗示自己作為真相來源，是不信任的受害者。可見中國國務院主管刊物「紫光閣」微博：
<https://m.weibo.cn/5467852665/4179205514123018>。

⁷ 類似言論可見該微博評論：<https://m.weibo.cn/1218639357/4179183309498633>。

⁸ 這種強烈不安已經使家長陷入「草木皆兵」的狀態——這位家長將其孩子的乾性濕疹以為是針扎的傷口。來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83949。

⁹ 類似言論可見該微博評論：<https://m.weibo.cn/1642088277/4179188464048048>。

¹⁰ Colin Hay,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211-213.

¹¹ Colin Hay, pp214.

¹² 官方利用「穩定」話語來合法化或非法化具體政治活動、事件以達到維護政權目的，這種做法可見「共青團中央」的微博，比如：<https://m.weibo.cn/3937348351/4170461078285285>，
<https://m.weibo.cn/3937348351/4156579252681557>，<https://m.weibo.cn/3937348351/4004362109589963>。

¹³ Peter Sandby-Thomas, “ ‘Stability overwhelms everything’ : Analysing the legitimating effect of the stability discourse since 1989’ , *Discourse, Politics and Media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s. Qing Cao et al.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pp.67-68.

¹⁴ <https://m.weibo.cn/5252675780/4136786874247040>

¹⁵ <https://m.weibo.cn/2640668825/4135291570353981>

¹⁶ <https://m.weibo.cn/3900215081/4177554585825816>

¹⁷ 「活塞運動」是原視頻受訪者使用的詞彙，在中國流行語常被用於指示插入式性交。

¹⁸ 甯應斌，〈Child Abuse、兒福法律與兒童性侵犯的政治〉，《兒童性侵犯：聆聽與尊重》（香港：圓桌文化，2009），頁189-190。

¹⁹ 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p12-13.

參考書目

1. 李土金 (2017)。〈中國大陸新浪微博用戶分佈特征初探〉。《中國市場》，4，142-146。
2. 甯應斌等 (2009)。《兒童性侵犯：聆聽與尊重》。香港：圓桌文化。
3. Arthur Kleinman et al. (2011). “Remaking the Moral Person in a New China” .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Colin Hay. (2002). “The Discursive and the Ideational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Beyond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5. Jacques Rancière. (2006).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London: Continuum.
6. Peter Sandby-Thomas. (2014). “ ‘Stability overwhelms everything’ : Analysing the legitimating effect of the stability discourse since 1989” , *Discourse, Politics and Media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s. Qing Cao et al.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